

2011年

经济与贸易评论

第6辑

Review of Economy & Trade

柳思维：基于制度创新的审视：贸易强国的历史与现实思考

陈日新、陈向阳：垄断竞争、中间产品与城市规模研究 —— 从城市的自组织角度考察

蒋伟：FDI在华区域分布的空间地理加权回归分析

唐红涛、徐志耀：基于ESDA的湖南省县域商业空间集聚分析

刘志杰：零售商的产品种类选择 —— 一个基于市场结构的解释

阳志梅：企业文化、组织学习对集群企业竞争优势影响的实证研究

Øystein Foros Hans Jarle Kind Jan Yngve Sand著 / 李陈华 译：通道补贴与生产商的零售商促销努力

全球零售企业250强

国际学术动态

科学观察

经济学期刊影响因子排名

工商管理期刊影响因子排名

经济学最有影响力的美国机构：2004—2008年

经济学和工商管理最有影响力的澳大利亚机构：2004—2008年

管理学最有影响力的加拿大机构：2004—200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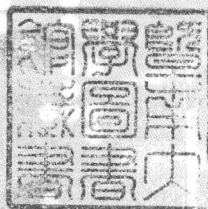
2011年

经济与贸易评论

第6辑

Review of Economy & Trade

主 编 柳思维
副 主 编 李陈华
执 行 编 辑 唐红涛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与贸易评论. 第6辑/柳思维主编. —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9

ISBN 978-7-5504-0423-6

I. ①经… II. ①柳… III. ①经济发展—文集②商业经济—经济发展—文集 IV. F21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82080号

经济与贸易评论(第6辑)

主 编:柳思维

副主编:李陈华

执行编辑:唐红涛

责任编辑:李 雪

助理编辑:高小田

封面设计:杨红鹰

责任印制:封俊川

出版发行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四川省成都市光华村街55号)
网 址	http://www.bookcj.com
电子邮件	bookcj@foxmail.com
邮政编码	610074
电 话	028-87353785 87352368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80mm×255mm
印 张	10
字 数	185千字
版 次	2011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4-0423-6
定 价	32.80元

1.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2. 如有印刷、装订等差错,可向本社营销部调换。

《经济与贸易评论》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

欧阳峤 唐未兵

编委会副主任

柳思维 李陈华

学术委员会

(以汉语拼音为序)

蔡继明 (清华大学)

陈启杰 (上海财经大学)

陈文玲 (国务院研究室)

陈晓红 (中南大学)

陈甬军 (中国人民大学)

谷克鉴 (中国人民大学)

洪 涛 (北京工商大学)

胡祖光 (浙江工商大学)

黄少安 (山东大学)

纪宝成 (中国人民大学)

纪良纲 (河北经贸大学)

赖明勇 (湖南大学)

马龙龙 (中国人民大学)

冉光和 (重庆大学)

宋 则 (中国社会科学院)

王德章 (哈尔滨商业大学)

文启湘 (西安交通大学)

夏春玉 (东北财经大学)

谢志华 (北京工商大学)

徐从才 (南京财经大学)

组 织 单 位

湖南商学院经济与贸易发展研究院

湖南省现代流通理论研究基地

执 行 编 辑

唐红涛

目录

基于制度创新的审视：贸易强国的历史与现实思考	柳思维 (1)
垄断竞争、中间产品与城市规模研究	
——从城市的自组织角度考察	陈日新 陈向阳 (17)
FDI 在华区域分布的空间地理加权回归分析	蒋 伟 (34)
基于 ESDA 的湖南省县域商业空间集聚分析	唐红涛 徐志耀 (47)
零售商的产品种类选择	
——一个基于市场结构的解释	刘志杰 (61)
企业文化、组织学习对集群企业竞争优势影响的实证研究	阳志梅 (73)
通道补贴与生产商的零售商促销努力	
..... Øystein Foros Hans Jarle Kind Jan Yngve Sand 著 李陈华 译	(84)
全球零售企业 250 强	(103)
国际学术动态	(128)
科学观察	(154)
经济学期刊影响因子排名	(154)
工商管理期刊影响因子排名	(155)
经济学最有影响力的美国机构：2004—2008 年	(156)
经济学和工商管理最有影响力的澳大利亚机构：2004—2008 年	(156)
管理学最有影响力的加拿大机构：2004—2008 年	(156)

基于制度创新的审视： 贸易强国的历史与现实思考

柳思维

摘 要：15 世纪初郑和七下西洋，领先于西方各国。但由于制度落后，近代中国错失海洋贸易机遇。荷兰、英国成为贸易强国，在制度创新方面各有特色。美国作为持续时间最长的贸易强国，其在制度创新方面的系统优势尤其值得重视与借鉴。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迅速崛起，成为贸易大国，这些都离不开制度变迁，中国要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仍然要通过深化改革进行制度创新。

关键词：基于；制度创新；贸易强国；思考

从 2007 年中国从位列世界贸易第三大国到 2010 年上海世博会的顺利举办，经历了美国金融危机冲击的中国正从世界经济贸易大国向经济贸易强国发展。为了加快中国从经贸大国向经贸强国的转变，我们应从制度创新层面思考加快中国经贸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本文特从历史与现实结合的角度对此作初步探讨。

一、历史上错失海洋贸易机遇的制度原因

15 世纪初，中国明代的三宝太监郑和在全世界首次带领远航船队七下西洋，

作者简介：柳思维（1946—），男，湖南岳阳人，湖南商学院经贸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liusw@vip.163.com。

创造了世界航海史上的奇迹与壮举。郑和首次下西洋是从江苏太仓刘家港出发。郑和带领船队七下西洋有三个显著特点：

(1) 时间早。郑和首次下西洋是1405年6月，比意大利人西班牙海军上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航行早了87年，后者是1492年才第一次开始海上远航并发现美洲大陆的；郑和首次下西洋比葡萄牙人达伽马绕道非洲好望角航行到印度早94年，更比麦哲伦的环球大航行早了110年。

(2) 航海船队规模大，技术先进。1405年郑和首次下西洋的船队共有200艘船，率领士卒27000余人，其中有62艘大船均是长为44丈（约146.7米），宽18丈（约60米），排水量大。^①1408年郑和第三次出使西洋时仍率官兵27000多人，大海船48艘。而87年后第一次远航的哥伦布率领的船队仅3只帆船，88名水手，最大的旗舰“圣玛利亚号”吨位为130吨，长35米，仅为郑和使用的大轮船长度的1/5。而110年后麦哲伦环球大航行的船队也只有5艘船，200多名船员。

(3) 航海持续的时间长、次数多，到达的国家多。从1405年到1432年，郑和下西洋共有七次，先后持续了27年。郑和下西洋所达国家之多，也是哥伦布的航海活动所难以企及的。郑和七次下西洋率领的船队一直从中国南海越过太平洋、印度洋，抵达东非，先后到达30多个国家。哥伦布也曾四次远航，但主要是历经美洲沿海一些岛国国家，如古巴、海地、牙买加、波多黎各、多米尼加、洪都拉斯和巴拿马等国。总之，从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与西方哥伦布等人的远航比较来看，当时的中国的经济实力、科学技术水平是远远领先于西欧各国的。

尽管中国郑和下西洋与西欧哥伦布等人的远航具有无可比拟的时间优势、技术优势、规模优势，但从制度层面而言，郑和的航海探险却与哥伦布等人存在明显的深层差异与制度劣势，主要表现在：

(1) 中西探海远航的目的与动机差异。郑和下西洋是明成祖朱棣的旨意，虽然也包含有发展朝贡贸易的成分，但其主要是出于单一的政治性目的。由于明成祖朱棣是通过起兵造反将其侄儿朱允炆赶下台当上皇帝的，为了对周边国家宣扬自己的文治武功，也为寻找传闻中流亡到海外的朱允炆，朱棣便命令郑和下西洋。而哥伦布等人发现新大陆的远航是以对外扩张为目的。哥伦布读过《马可波罗游记》后从1474年起就萌发了远航到中国、印度、日本寻找黄金的想法，1492年他这一想法得到西班牙国王的支持，1503年哥伦布在致西班牙国王和王后的信中写到：“黄金是一切商品中最宝贵的，黄金是财富，谁占有黄金，谁就能获得他在世上所需的一切。”哥伦布在航行日记中更表达了他寻找黄金和香料的冲动，“我尽

① 白寿彝. 中国通史——明史.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一切可能去找有黄金和香料的地方……”

(2) 中西探海远航的文化背景差异。明、清社会缺乏重商主义思潮与对外开放理念对海上探险的支撑。而西欧各国在 15 世纪以后兴起的开拓新航路的航海活动之所以不断扩大和绵延到更多国家，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重商主义文化的支撑；第二个是西方基督教对外扩张文化的影响。

(3) 中西探海远航激励与约束制度的差异。1492 年，哥伦布在远航之前，经过三个月的谈判，与西班牙伊莎贝拉女王签订了“圣塔菲协议”，协议有几项重要的制度性规定：一是女王陛下预封哥伦布为“新发现的土地”^①的统帅，并可世袭，这是一项长期的权力激励；二是女王任命哥伦布为新发现的陆地或海岛的副王和总督；三是新发现土地总收入的分成激励，即哥伦布对“新发现土地”上的总收入，包括金银、宝石、香料和一切商品，拥有 10% 的分成比例，并可免税，为自己支配和使用，这对于冒险者的哥伦布来说是一种预期利益激励；四是司法权授予，任何涉及“新发现土地”上的商品或产品的案件都由哥伦布或他的代理人以统帅身份进行裁定；五是授予哥伦布选择权，对驶往新属地的船只负担总费用的 1/8，或收其利益的 1/8；六是具有对“新发现土地”的命名权。此外西班牙国王还授予哥伦布“海军上将”军衔和贵族爵位。上述这些制度在西欧各国的航海探险活动中起到了推动作用，包括后来英国政府对移民美洲、大洋洲的民众，都采取了类似的制度。这种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普通公民甚至是囚徒前往海上探索的积极性，为那些借此通过航海发现新航路和从事海上贸易以改变生活现状的冒险家们提供了一种心理预期，也是对这种行为的一种倡导和鼓励。其后，英国、法国、美国等西方国家都纷纷效仿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早期海洋贸易强国的做法，建造大舰巨船，组建商船队和贸易公司，纷纷走出国门，进行航海探险，致力于海外贸易，寻找商业机会，掠夺金钱、土地、人口，积累财富。如美国在 1776 年刚与英国签署独立条约，其海上贸易的商船队就在全球各大洋中游弋，其中到达中国海岸的第三只船“实验号”有 18 吨重^②。相反，郑和七下西洋没有任何制度激励，只是服从皇帝的旨意与命令。

(4) 中西探海远航主体组织制度的差异。除了激励与约束制度的差异外，更为重要的一种制度差异是中西远航探险主体组织制度的差异。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前后，西欧的航海探险贸易均以公司制的企业组织为主体进行，早期的海上贸

① 即西班牙海外殖民地。

② 《学习时报》编辑部，落日的辉煌：17、18 世纪全球变局中的“康乾盛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11。

易公司是一种借贷合伙的两合公司即康孟达 (commenda) 和稳定持久的合伙公司即索塞特斯 (societas) 组织, 这是带有股份制萌芽形态的公司组织, 后来就出现了国王特许设立的股权多元化的股份公司, 如 1553 年英国成立了第一家股份制的海外贸易公司莫斯科公司, 共 240 股, 每股 25 英镑, 总股本 6000 英镑。1600 年英国成立了东印度贸易股份公司, 1602 年荷兰成立了永久性的东印度贸易公司, 专门从事海上贸易。就这样, 西欧的股份制企业迅速在海外贸易领域发展, 掀起了公司制企业发展的第一个高潮。企业组织制度的创新, 既解决了单个资本无法从事大规模海外贸易的资金限制与风险独担的问题, 更为欧美发达国家的贸易振兴和经济崛起提供了活力无穷的内在动力。

从哥伦布到麦哲伦, 持续不断的航海探险, 新航路的不断扩大和海上贸易的扩大, 引发了马克思所称的“商业上的大革命”。这场商业革命不仅使世界贸易中心从地中海沿岸转移到了大西洋沿岸, 同时扩大了欧、亚、非、美各大洲之间经济和文化交往。此外, 这场商业革命突破了欧亚封建自然经济的封闭性, 带来了人口迁移和全球性的民族移民, 更为重要的是加速了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因素的生长, 加速了封建生产方式的瓦解。对此,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深刻地进行了论述: “美洲的发现, 绕过非洲的航行, 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 使商业、航海业空前高涨, 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①

与西欧各国持续不断实行的鼓励海上探险、海上贸易的政策与制度相反, 明朝前期实行扩大朝贡贸易的政策, 明代郑和下西洋间较活跃的是沿海各国对大明王朝的朝贡贸易。自 1443 年郑和逝世后, 明朝便停止了“下西洋”的活动, 朝贡贸易也走向衰落, 明代随之实行了海禁政策。当 15 至 16 世纪葡萄牙商人在我国东南沿海进行贸易侵略时, 明朝统治者便采取了加强海禁, 严控下海贸易的政策。但由于当时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走在各国前面, 中国与周边海上诸国的贸易基础深厚, 海上民间贸易仍十分广泛。政府的海禁引发了海上私人贸易者的反禁海斗争。个别沿海居民冒险进行贸易, 海上走私贸易的组织大多是海盗商帮或是沿海的豪门巨富冲破朝廷禁令铤而走险。走私最活跃的地区是福建漳州、泉州一带, 到明代中期具有交通区域优势的浙江舟山群岛与福建漳州至广东汕头沿海一带都分别成为国际海盗商人的贸易中心与海上走私贸易中心。倭寇在福建、广东、浙江沿海一带活动猖獗。直到平定倭寇后, 明嘉靖后期才开放海禁, 海上私人贸易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1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273.

才有所恢复和发展。

面对沿海私商的反海禁，明王朝关于禁海的政策也越来越严厉，如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明令规定将所有航海大船报官拆毁，以绝后患，违者一律重治。嘉靖十二年（公元1533年）行下海贸易连坐法，再次规定，一切违禁大船，尽数毁之。沿海居民，私与贼市，其邻舍不举者连坐。^① 17世纪中叶清王朝建立后，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为防止海内外反清复明的政治势力的联系，便实行禁止沿海居民出海贸易和捕鱼的政策。如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下令沿海地区禁造二桅以上的大船，次年又下令浙江、福建、广东、江苏、山东、天津等地“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②。后来，清朝统治者虽然也调整了海禁政策，允许沿海居民海上通商贸易，如1684年由于清政府统一了台湾，平定了三藩，康熙皇帝才改变原来“片板不许下海”的禁海政策，实行有限度的海外贸易政策，开放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③四处为通商口岸。但清朝统治者对于世界海上贸易发展大势仍茫然无知，根本看不到海上贸易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一直以天朝大国自居，对各国发展对华贸易以戒备防范为主。一直到乾隆盛世，都只把对外通商当做怀柔外夷的手段。当英国商人来到中国门口要求扩大通商并称中英通商“与天朝有益”时，乾隆皇帝却谕令两广总督苏昌：“国家四海之大，何所不有，所以准通洋者，特系怀柔远人之道。乃该夷来文内，有与天朝有益之语。该督等不但当行文笼统驳飭，并宜明切晓谕，使知来广贸易实为夷众有益起见，天朝并不藉此些微远物也。”^④ 1793年10月7日，乾隆皇帝接见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后，在给英王乔治三世的第二封信（敕谕）中写道：“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通以有无。”^⑤ 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时又关闭了其他三个开放口岸，只开放广州市为对外贸易口岸，厦门、宁波、上海曾严禁外人、外船进入。

思路决定出路，观念决定行动。15世纪中叶以后明清两朝相继都实行海禁政策的制度安排，使郑和下西洋的成果前功尽弃，也使近代中国错失了海洋贸易与重商主义的历史机遇。尽管清代有过辉煌的“康乾盛世”时代，到乾隆鼎盛时期中国的耕地面积及农作物产量占世界第一，中国人口从1700年前后的1.5亿增加到1794年（乾隆五十九年）的约3.13亿，占了当时全世界总人口1/3，到19世

① 王毓铨：《中国经济通史》，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547。

② 方行，经君健，魏金玉：《中国经济通史——清史》，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7：1052。

③ 今连云港。

④ 《学习时报》编辑部：《落日的辉煌：17、18世纪全球变局中的“康乾盛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14。

⑤ 萧致治，杨卫东：《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254-256。

纪初全世界 10 个 50 万人口的大城市中国占了 6 个（即北京、南京、扬州、苏州、杭州、广州），但由于制度落后，已失去海洋贸易和重商主义战略机遇的封建中国，内在的资本主义因素不能积极生长，其封建躯壳必然崩溃，也必然会在一场新的国力竞争中处于下风。1840 年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中国经济从此一落千丈，一步步沦为西方列强宰割的对象。“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社会的代表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①

二、世界贸易强国持续发展的历史启示

（一）荷兰、英国相继成为经济强国的制度创新思考

16 世纪至 17 世纪率先崛起的贸易强国是葡萄牙、西班牙与荷兰。在这三国中荷兰的制度创新尤其值得我们重视。17 世纪的荷兰，国土面积仅为北京市面积的两倍半，人口仅 200 多万，却垄断了全球一半的贸易。

荷兰在全世界经济制度上的创新最突出的是在贸易公司制度的股份产权制度与金融制度上的创新。荷兰创办了全球最早的海上贸易联合股份公司，1602 年经荷兰议会批准成立了以阿姆斯特丹工商业者为主体的“尼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总资本为 650 万荷兰盾，约 50 万英镑。东印度公司采用股份制的产权制度安排向全社会募集资金，连平民也可参股，有的股东仅参股几十个荷兰盾。1609 年荷兰在世界建立了第一家银行阿姆斯特丹银行，银行广泛吸收社会闲散资金，这也是世界近代金融史上的创新。荷兰股份制贸易公司的出现和金融业发展的创新实行了两大联合：一是实现了把广大居民的利益与海外贸易直接结合起来，让荷兰各阶层都参与海洋贸易中；二是实现了荷兰商人、冒险家与政府在海外贸易进行联合扩张的过程，国会授予荷属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洋、太平洋一带的贸易垄断权、货币铸造权与建立殖民领地等种种权力。

荷属东印度公司的成立与经营，率先创立的股份制与金融体制创新，大大提升了荷兰在海外贸易扩张的能力，并带动了荷兰造船业的迅速发展。17 世纪荷兰商船队拥有商船 16 000 多只，总吨位超过了英国、法国、葡萄牙、西班牙四国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16。

船队总和。贸易大发展又带来了资金的大汇兑、大清算、大融通，阿姆斯特丹也迅速成为世界银行业务与交易中心。与此同时，阿姆斯特丹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家规范的股票交易所，并迅速成为国际股票市场交易中心。除了股票交易外，荷兰人在雄厚的资本积累基础上，还以债券与股票的形式投资了东印度公司，17世纪，荷兰对外投资比英国多15倍。

继荷兰之后，近代“世界老大”英国的崛起，在制度创新方面也值得借鉴。英国成为世界经贸大国、强国的模式较之荷兰更有其显著的特色。当然英国成为经济强国的过程也明显带有对外扩张的特色，但已不是靠单纯的海外殖民掠夺与贸易，而主要依靠制度与技术创新领先、工业主导得以崛起，并靠制度创新的优势与发达的工业与技术支撑海外扩张。除了海外扩张外，其成功的要素主要有四个：一是政治制度的革命与创新为工业革命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扫除了体制障碍；二是抓住机遇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革命，迅速实现工业化而执世界经济牛耳；三是建立国内统一的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体系，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创造良好的基础；四是靠发达的工业与技术支撑海外扩张。

18世纪中叶第一次工业革命前，英国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一直没有间断，并在17世纪80年代用不流血的“光荣革命”结束了封建王权的统治，用议会限制了国王，自由取代了专制，法治取代了人治，是世界上第一个结束封建专制王权的国家。它第一个建立了现代内阁责任政府，建立了资产现代民主制度，保证社会有宽松平和的环境，产生了一套保护私有产权、保护发明专利权的法律制度，鼓励人们追求个人利益，激励技术创新和发明在工业生产中广泛应用，让人们追求个人目标，最大限度发挥创造力，从而为生产力新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形成了有利于资本主义成长的制度框架。随之，英国成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与中心，19世纪50年代初在英国伦敦举办世界第一届博览会时，英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化国家，号称“世界工厂”，1850年英国生产了世界50%的生铁、50%以上的煤炭，加工全世界50%的棉花，1850—1870年间英国对外贸易量总额超过了法、德、美三国总和，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强国。^①

（二）美国经贸强国持续发展的制度创新启示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接替英国成为世界近代史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经贸大国、经贸强国的是美国。美国的制度创新比英国更彻底且更富有特色，特别是不断完善以法制为基础、权力制衡为特征的现代民主政治制度，完善自由竞争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不断完善保护私有产权、保护发明专利权的法律制度体

^① 刘祚昌，等. 世界通史·近代卷上.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42-443.

系,充分调动人们开展技术创新与技术革命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使美国的制度设计彻底摆脱了英国封建专制和美国本土南部奴隶制的影响。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稳定的宪法及不断发展完善的宪政成为一切制度创新发展的基础,也是美国自建国以来保持政局稳定、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美国在世界上首创的以成文宪法为核心,以最高法院司法审查为制度保证的宪政体制成为美国的立国之本。1776年美国推翻英国殖民统治独立,1787年来自独立后13个小邦国的55位头面人物聚会费城制定美国宪法,这些美国开国元勋多是知识精英,制定美国宪法时,历史性地解决好了行政权力结构内部的权力制衡问题。美国制宪者及美国宪法的贡献在于将一系列行政权力制衡原则具体化为一套可操作的制度,并以成文宪法的形式固定下来,不给任何集团和个人专制、专权与集权行为留下空子。美国宪法确立的权力制衡关系是通过以下三个层面的科学设计来安排的:

第一是地方(州)政府权限和中央(联邦)政府权限的制约和平衡(制衡)。宪法明确授予联邦政府的权力,如外交权、宣战权、管理州际贸易和对外贸易权、货币发行权等权力;明确禁止各州政府拥有的权力,如外交、铸币等权力,其余权力皆由各州保留。

第二是联邦政府立法权(国会)、执法权(总统)和司法权(联邦法院)三权的制衡。美国宪法规定只有国会才能制订和通过法律,但这些法律需要总统签署才有效;总统可以否决国会立法,国会则能够以三分之二的票数推翻总统的否决。

第三是立法机关的内部制衡。为了防止未来国会可能会出现“多数(大州和民众)暴政”,美国国会分成众议院和参议院两院,任何法律都必须由两院同时通过。众议院议席按人口的多寡成比例分配,由此来满足人口较多的大州的要求,而参议院则不论大州小州,一律只有两个议席,这样小州也皆大欢喜。

美国宪法颁布后,在实施过程中又不断完善,完善的重点是保障公民的各项权利和限制政府的权力。于是就有了保护民众言论、结社、信仰和刑事程序等权利的宪法前十项修正案,也就是著名的《权利法案》。《权利法案》的核心,就是以公民权利来限制政府权力。尽管美国宪法构筑了政府内部权力结构的制衡,但如果没有从外部对行政权力监督和限制,则很难防止立法、行政、司法官官相护、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正所谓“剑不可自击、秤不可自衡、病不可自医”。因而外部公开的监督就是对各种行政权力最好的制约。《权利法案》用宪法所保障的言论、结社、请愿和出版自由来制衡和约束政府的官权,最终与宪法的原文一起,构建用权力制衡权力、借舆论监督权力、以民众权利限制与监督政府权力的宪政

体制。

在《权利法案》所保护的自由中，最重要的是保障民众言论自由的权利。言论自由使代表“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能够尖锐地批判资本主义贪婪的本性，也可以让当权者的各种政敌无情地揭露（或者相互揭露）政府的腐败、丑闻与失误，更能为那些关注国家命运与前途的有识之士提供了一个发挥自己才智、出谋划策的机会，也可在对现行制度与社会现实的批判监督文化氛围中，培育历练一批治国理政的创新性人才，为奋发有为的社会精英从社会底层通向行政高层提供公平的机会与平台，同时形成一种对国家与政府的常态性自我批判机制与制度文化，使当权者使用权力的全过程也变成各种社会力量自觉监督权力运行的过程。从此，年轻的美国凭借着民主、自由和人权等方面领先于世的政治理念与政治体制，以及与英国自由市场经济相似的经济制度，使自己一步一步走上了富强之路；同时，美国把领土扩张与经济开发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廉价购买与国土扩张，形成了美国东西部濒临大西洋与太平洋的区位优势，又采取开放兼用国际资源及广纳世界各地人才、资金的正确战略，如到1890年美国吸引欧洲投资达30亿美元，1871—1907年有2000多万国外移民来到美国，为美国工业化是提供了大量劳动力。保护私人发明专利权制度刺激了科技创新，1860—1890年间美国政府颁发专利证达44万份之多，使美国很快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中心，19世纪末美国工业产值居世界第一位，超过了英国，成为世界工业霸主^①。随后，美国在世界经济贸易中的比重一直领先于世界各国，并在世界贸易与世界金融体系中一直独占鳌头，掌握着规则制定的话语权与主导权。

从历史上看，自19世纪末美国赶上并超过英国一跃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与贸易强国，其贸易强国延续的时间最长，尽管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大经济危机的冲击，又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以及20世纪70年代能源危机、90年代互联网泡沫危机、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的冲击，但历次金融与经济危机也成为美国制度创新与调整的契机，如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时代“罗斯福新政”中的制度创新，20世纪80年代中期里根告别凯恩斯政策的“第二次美国革命”^②，2008金融危机爆发后黑人奥巴马当选总统应对危机的改革创新。当然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以及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型市场经济国家的迅速发展，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在下降，其深层的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也早已病入膏肓，但短期内美国作为世界经济第一强国的位置不会被其他国家取代。

① 刘祚昌，等. 世界通史·近代卷下.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782.

② 1986年美国税制改革法案。

总之,一百多年以来美国作为世界第一的贸易强国的地位仍然能够保持,这不是由单—的比较优势决定的,这是因为美国具有综合的系统的动态竞争优势:①大国的资源禀赋及大国市场潜力巨大的比较优势。②教育立国、人力资本及技术创新的核心竞争力优势尤为明显,如全世界最优秀的大学美国最多,全世界最优秀的科技人才在美国集中度最高,获诺贝尔奖的专家在美国工作的人数最多,科技创新的专利最多。③国际贸易具有强大的产业基础优势,农业、制造业、高科技产业、服务业的现代化水平高。④国际贸易的主体——企业战略竞争力强,具有集中度高、名牌多、行业话语权强的优势,一大批超大型的跨国公司成为贸易强国的实施者。⑤美国具有强大的国际商业网络与营销渠道优势。⑥美国金融业发达,作为世界金融的中心,具有主导金融杠杆调节国际经贸关系的优势。⑦美国制度与文化的优势,政治架构中的权力制衡机制保证了政治制度的长期稳定,鼓励国民对现行体制及运作进行反思与批判的文化促进了制度的创新,反过来促进经济与贸易的发展。⑧美国经济与贸易具有较强的自我修复能力优势。

特别要指出的是在进入 21 世纪后,以中国为代表的“金砖四国”的迅速崛起,美国在世界经济贸易中的份额呈下降趋势,美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矛盾也在金融危机中暴露无遗,美国经济贸易强国的地位已受到严重挑战。但美国作为经贸强国的制度优势并未完全丧失,特别是美国在全球化的人才竞争中仍具有别国难以撼动的优势,尤其在尖端科学与工程技术领域,集聚了世界各国一大批科技精英。毋庸讳言,国内名校理工科尖子学生留学美国后,绝大部分都滞留未归,这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阴谋,也不是留美学子不爱国,而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科技与知识精英对制度综合环境跨国界选择的结果。对此我们应以理性的分析来取代狭隘的民族偏见,用学习与借鉴的眼光来代替传统的政治批判。要明确当代的世界经济战争,最重要的已不只是“贸易战争”、“货币战争”、“石油战争”、“粮食战争”等,而是人才争夺的战争。“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是一条铁的规律,我们应认真思考。

三、中国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的制度创新

(一) 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变迁使中国迅速崛起为贸易大国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至今是中国经济总量增长最快的时期,也是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史上创造奇迹的时代。经过 30 余年努力,中国已成功从一个经济贸易小国崛起为世界经济贸易大国。这 30 年我国 GDP 年均增速达 9.8%,为同期世界经

济平均增速3倍以上，居全球第一。我国经济总量连上几个大台阶：国内生产总值1978年为3645亿元，1986年GDP突破1万亿元，2001年达到10万亿元，完成这一跳跃用了15年；而从10万亿元到2006年的20万亿元，则只用了5年；到2008年实现30万亿元的增量，仅仅花了两年时间。根据测算，2008年平均一天创造的财富量就超过了1952年全年总量。

据统计，2009年我国人均GDP已经接近3700美元。根据世界银行划分标准，中国已由低收入国家进入世界中等收入国家行列。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也在逐步增大，从1978年的1.8%提高到2008年的7.3%。位居美国和日本之后，居世界第3位。同时，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也大幅提升。1978年，这一比率仅为2.3%，与美国相差35个百分点，与日本相差15.9个百分点，与欧元区相差13.6个百分点。到2008年，我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已超过20%，仅次于美国居第2位，与主要发展中国家相比更是遥遥领先。

改革开放以放30多年来，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上，中国已从贸易小国走向贸易大国，国内外贸易也获得空前发展。2009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12.5万亿元，比新中国成立初期1950年的171亿元增长了733倍，比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的1559亿元增加了79倍。2009年全国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9391元，比1950年的人均31元增加了302倍，比1978年的162元增加了57倍。1979—2008年对外进出口贸易总额年均增长16.7%，居世界位次由1978年的第29位跃升到第3位，仅次于美国与德国，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也由0.8%提高到7.9%。与此同时，进出口商品结构不断改善。1980年，农副产品等初级产品出口所占比重高达50.3%，2008年，初级产品比重已经降到5.4%，机电产品等工业制成品比重则上升到94.6%。量的增加和结构的改善使我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对外贸易大国。1952年，我国外汇储备只有1.39亿美元，到1978年，也只增加到1.67亿美元，1990年外汇储备超过百亿美元，达到111亿美元，1996年超过千亿美元，达到1050亿美元，2006年超过1万亿美元，达到10663亿美元，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一位，2009年我国外汇储备已超2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一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贸易发展如此之快，用传统的库兹涅茨的经济增长理论或索洛的新增长模型，都无法解释清楚。我认为根本原因是中国经济制度变迁与创新的结果，制度变迁是中国经济与贸易增长的内生动力。回想当年，正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通过“真理标准大讨论”，破除了“两个凡是”的现代迷信精神枷锁，着力解决了影响生产力发展、阻碍经济贸易发展的体制障碍，中国经济贸易之舟才顺利起航。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看，正是渐进性的制度

变迁引发了中国经济运行机制的变化,从引入市场调节机制来寻求对传统运行体制的突破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探索,即邓小平同志所讲的“摸着石头过河”,如从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自发按手印搞分田包干,到最高层顺应民心作出废除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公社制度”的决定,农业生产领域的制度变革引发了全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

从贸易领域的制度变迁来看,在贸易主体上,从肯定“傻子瓜子”和允许农民长途贩运、私人经商、发展个体商业,到大规模引进外资外商,迅速改变了国有经济主体独占国内外贸易的状况,形成了贸易领域的多种所有制主体、多条流通渠道并存。在贸易运行机制上,从放开商品的指令性购销和指令性价格,不断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与力度,由市场为主来决定价格与资源配置,引发生产要素市场的培育与市场取向改革深化。在贸易领域扩大对外开放的改革来看,从大量进口国内市场短缺的商品与物资,以增加国内市场的有效供给,到以进养出、加大设备、技术、原材料进口,实现国际资本与中国劳动力要素的有效结合,发展加工贸易,扩大商品出口;从启动入世贸组织谈判,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后经贸规则与世界经贸规则的全面对接;从扩大经济合作与招商引资,到实施“走出去”战略,使中国企业进入世界各国从事生产经营,中国经济贸易已与国际市场进行着全方位接轨。

总之,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正是以上一系列的制度变迁,带来了中国经济与贸易的持续快速发展,使中国从30多年前的一个经贸小国迅速崛起为仅次于美国的经贸大国。回想1972年我随湖南外贸代表团第一次参加广交会,当时广交会上传达了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希望大陆的外贸出口额能尽快超过我国台湾地区,遗憾的是直到1976年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周总理的愿望也未能实现。而今天,中国的外贸出口额不仅早已远远地超越了我国台湾地区,而且几乎把所有西方发达国家都抛在后面。

(二) 中国成为贸易强国的任务仍然艰巨

虽然经济总量和外贸总量规模较大,但是中国经济贸易的快速增长仍是一种传统粗放式增长,是一种高投入、高消耗、高成本、高污染、低效益的增长。中国距世界经济强国还具有较大差距,这是因为:

(1) 出口贸易结构失衡。一是出口商品中,低端加工品多,贴牌商品多,一般性制成品多。我国虽然已是第一出口大国,但90%以上产品为低端、低附加值产品,靠廉价出口,真正具有全球性品牌的商品少,高端产品少,高技术含量商品少,大部分商品出口附加值普遍低,换汇成本高。二是中国出口贸易结构中服务贸易的比重低。中国作为贸易大国仍是一个单一的货物贸易大国,出口的服务